

全观诗学的中国根基与理论建构

孙正国(土家族)

内容提要：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积极响应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要求，以学科范畴、知识对象和方法论为基本框架，探索本学科的自主知识生产与理论研究。在此意义上，近五年来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在诗学方向有所突破，全观诗学、故事诗学、交流诗学相继出场，尤以全观诗学为著。全观诗学重视中国史诗的知识生产传统，强调口头媒介的人类学始源性价值，探索口头文学的全球性、全景性、全媒介性和全知识观，再现口头性建构言文、东西方、古今、异文之间普遍联系的全观力量，阐明口头文学与其他艺术深度关联的诗学立场与三维层级谱系，这是全观诗学基于中国民间文学学科、面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建构。全观诗学在融合的媒介世界中点亮口头性的历史光辉，对自主知识生产与现代学术史对话颇具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全观诗学 中国民间文学 口头媒介 自主知识体系 三维层级谱系

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百年发展史的底层逻辑是对人民口头文学的现代性发现、主体性重建与学科性设计。现代性发现维度有两个典型的民间文学文类实践。一是晚清时期神话学的崛起^①，确立了中国民间文学与世界近代史之间的血脉联系。近代的西方殖民主义警醒了中国的神话学人，他们在对民族起源和民族精神的开掘中，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现代性张力。二是“五四”新文化背景下的北大歌谣运动^②，歌谣所具有的民主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双重现代性价值，确立了现代中国上层社会与精英文化阶层重视民间文学的新文学史观。歌谣刚健清新的艺术风格与批判假恶丑的革命主题，彰显了民间文学宏大的现代文化转型力量，远远超越了歌谣的语言对白话文运动的时代贡献。主体性重建维度则是对民间文学创作者——人民的主体性重建，来自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深刻影响。在学科设计的维度，梁启超、蒋观云、刘半农、鲁迅、沈尹默、杨宽、钟敬文、郑振铎等学者积极探索神话、歌谣、故事等的民族文化功能，为中国民间文

^① 钟敬文：《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08—258页。

^② 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进入 21 世纪,刘守华提出了“走向故事诗学”的学术命题,朝戈金发表了《“全观诗学”论纲》。两位学者关于中国民间文学学科诗学走向不约而同的理论思考,无论是作为理论史节点,还是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未来前景,都具有学术史与方法论的双重意义。刘守华强调:“不论是将神话、传说、故事融为一体建立民间叙事学,还是在民间口头文学、通俗文学、作家文学三位一体的大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宏大背景上来考察民间故事,或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视野中来审视这些口头语言艺术奇葩,都有待于‘故事诗学’的新开拓,因而‘故事诗学’具有广大而无比诱人的学科前景。”^②朝戈金认为:“‘全观’并不是在该词‘完整、全体’等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基于‘整全观’(holism)立场——在广泛联系和发展变化中系统性地观照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全观’乃是恪守口头文学的理论视角和学术立场来统摄文艺活动的整体,不过更强调立足今天观照古代、立足东方观照世界、立足口头观照书面、立足文学观照其他艺术。质言之,全观诗学是立足口头文学之本体,围绕口头文学之问题,引入多学科视域而构建的文学阐释体系……就是同时将行动主体、历史进程、精神风貌、文化生态、艺术嬗变、实践操演等彼此相关的层面和维度都纳入考量的方法。”^③继此之后,诗学研究对中国民间文学回归中国文学二级学科的合法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今天,我们立足民间文学的国际视野,呼应国家新文科发展方略,重新讨论《“全观诗学”论纲》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就必须在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架构层面深入思考诗学研究的独特价值,全面参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一 作为问题背景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时代之需,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双重价值,一是对西方近代知识体系的反思和重构,二是对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应有贡献……建构以人为核心,包含科技、组织、行为、治理‘四位一体’的新型知识体系自主性框架。”^④人文学科处于这一体系的基础地位,可以明确知识生产的价值逻辑、文化立场及其情感取向。在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矛盾中,重新梳理现代学科制度下知识生产的因素,重新思考传统人文学科向现代人文科学转型的根本性特征,即由注重体悟、强调伦理、倾向主观阐释的意义之学,转型为建构知识范畴、突显数据验证、追求规律模式的知识之学,对于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关键作用。这种知识生产的现代转型,从表象上看是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外在结果,本质上则是人类知识形态丰富发展的内在必然。整体性、时代性的人类认识能力大幅度提升,必然要求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科学知识重新得到检视,并以更优化的方式被人类所理解和接受。原来以

① 参见万建中《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 40 年》,《西北民族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② 刘守华:《走向故事诗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

③ 朝戈金:《“全观诗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9 期。

④ 杨东、徐信予:《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论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 年第 3 期。

局部的、区域性的知识体系推行于全人类的知识应用框架,也因人类认识能力的大幅度提升而受到反思。

重新强调知识生产的经验传统,发掘不同文明所创造的多样化知识类型的资源与价值,正是当代世界知识生产的显著特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实践需要,首要问题是阐释文化传统的“原创性概念”,提炼中国文化实践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概念’凸显的是其所实现的‘术语的革命’,‘标识性概念’则不仅具有‘原创性’,而且凸显特定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实现‘术语的革命’,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最为重要的概念基础。”^①概念基础的梳理与建构,成为人文学科参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基本路径。“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或者说,社会科学是西方社会近(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和西方的转型相比,中国当代转型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来说,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转型为社会科学界创造了可观的条件来进行知识创新。当然,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可以检验所有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②在此背景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必然性与创新性,决定了每个具体领域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总原则。

那么,从人文学科出发,讨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知识表达层面,在传统学科范式早已被现代科学范式解构、重组且全面替代的语境下,如何还原和使用传统学科范式?知识体系层面,镶嵌在传统生活世界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如何提炼和发展为现代知识体系?

就全观诗学的理论诉求而言,上述命题可以转换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诗学命题,由此建构其面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诗学范畴。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代学术语境,成为全观诗学理论创新路径的重要条件。本土资源、本土学术传统和本土知识现代化模式等基本命题,皆与全观诗学的理论创新有内在的密切关联,全观诗学在整合民间叙事资源、重建民间艺术叙事理论、推进史诗学的现代转型等方面理论目标明确。近年来,学界努力创建民间文学的多维度诗学研究,尝试以中国丰富的口头文学资源为根基,汲取人文传统通透圆融的学术智慧,超越民间文学学科体裁论的分殊与隔膜,打破以书写媒介和作家个体为标准的文学史篱墙,创新了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这不仅为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了独特力量。

二 全观诗学的自主知识探索

中国民间文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发轫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期西学东渐的时代。较少

① 孙正聿:《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24 第 7 期。

② 郑永年:《中国知识体系的缺失与建设问题》,《学术界》2012 年第 1 期。

受到传统知识体系束缚的民间文学学科,从一开始就肩负着科学与民主的现代性使命,尽管从现象学意义上说,先知先觉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该学科赋予了这一使命。民间文学天然地具有批判性与民主性的质地。北大歌谣征集活动中,民间文学的政治革命价值与文学革命价值涌现,从此启迪了中国学界对神话、故事、传说、史诗、歌谣的全新认识,进而形成现代中国民间文学的知识生产。在此意义上,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在初创时期便具有宏阔的学术视野、独到的诗学眼光与鲜明的时代精神,为百年后全观诗学的形成奠定了潜在的学术史基础。20世纪30至40年代,凌纯声、芮逸夫、吴文藻、杨堃、黄文山、孙本文、江应梁对东北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故事、史诗的采录与研究,社会-民族学派的西方理论与中国西南地区田野材料相结合,形成了一批可观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成果。^①20世纪中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使民间文学作为口头文学创作理论得到较大扩展。20世纪后期,西方理论被大量引入中国学界,以人类学、心理学、叙事学和社会学为主体的西方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研究面貌。

(一)外源型知识生产的启示与双重影响

一个国家的知识生产理论与方法主要源自外部,源自其他国家的知识生产成果,缺乏自身的原创性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的类型可被称为外源型知识生产。在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现代发生时期,当时主要的知识生产来自西方。刘锡诚认为,中国民间文学作为现代学科翻开的第一页是神话学^②,而早期中国神话学的理论方法大多源自西方。因为近现代的中国处于强敌入侵、国难深重、传统分崩离析的文化转型期,受西方人类学影响,出于救亡图存的国家需要,神话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与情感载体,从中追溯民族起源,不仅能够凝聚人心,还能激发人民的文化自信与抗击侵略的信心、决心,延续中华民族的故事传统与精神脉络。总体而言,外源性知识生产一方面帮助现代转型时期的中国民间文学建构了新的知识生产方法,即科学的田野实践分析法,另一方面则传播了西方现代文明及其科学主义知识体系的价值观。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知识生产具备方法论与价值论的双重特性,其主体或多或少都经历了现代思想的启蒙,受到西方人类学方法的影响。

综上所述,外源性知识生产的范式是以丰富多样的西方理论方法,观照中国本土文化现象并予以理论总结。由此形成了西学东渐的两种知识生产形态:一是现代学科形态,本质是西体中用;二是方法先行的本土现象研究形态,本质是中体西用。现代学科体制的核心是科学分析主义,它推进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本土现象研究的核心是理论验证主义,它强化了以西方理论方法为标准的学术理念与实践取向。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与知识生产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外源性知识生产范式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学术影响,中国学术界形成

^① 参见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412—423页。

^② 同上书,第17页。

了重视西方理论的普遍共识。“一切外因在对事物系统的运动发生影响时,总要把一定的物质材料和一定形式的能量或信息输入到这一物质系统中去。因此,一切外因都或大或小地构成事物系统运动的内容,规定运动的性质和方向,就是说,外因也起变化的‘根据’的作用。”^①反之,外源性知识生产也导致了极其严重的缺失本土理论创造力的负面影响。西方理论对中国本土实践的指导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学界的理论意识与创新能力。

(二)内生型自主知识生产

内生型自主知识生产是一个优秀传统文化的显性特征,它以自身的历史实践、自然探索和社会经验为对象和材料,以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为内生动力,以原创性方法和标识性符号为内生工具,不断发现、反思、总结自主知识的来源、特征、功能与价值,从而创造符合历史规律与社会要求的自主性知识及其体系,建构本土原创性、自主性的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从而使现代文明具备独立自主的知识创造能力与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全观诗学作为内生型自主知识生产的概念,高度契合了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要求。全观诗学着眼中国民间文学及其改编、传播的多种艺术形态,突破体裁论意义的单一文学概念,以口头媒介叙事、新媒介形态为范畴,以“口头文学”为标识性符号,以中华诗教传统及其观念为理论来源,重视文献学方法和采诗观风的调查方法,提炼诗学结构、人物伦理、情感转换等方面的诗性特征,这是我们理解全观诗学本土根基的重要维度。

其一,诗学结构方面,全观诗学强调形式、意义与人的价值的结构性统一。中国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因素,在诗学上有以线性声音(时间)与立体语境(空间)多重并置的二元复合结构。这一复合结构突出了主体的实践价值,创造性地建构了“演述-人-演述”的口头文学模型。关于这一口头文学模型,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演述者向人演述,前一“演述”是口头表演者的行为,“人”是受众,被动接受演述内容。后一“演述”则是“人”将所接受的口头文学内容,再次演述给另外的听者。另一种理解方式是“人”主动接受,前一“演述”指演述文本或内容,“人”是学习者,主动掌握演述内容。后一“演述”则是“人”作为演述者的行为,以开放的生活实践,向未知的、具体的接受者传播口头文学内容。人类口头交流传统的简练、稳定、兼容性强的超时空特征,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宏观叙事的思维原型结构。在传统民间文学的视野里,认识中国口头文学的这一原型结构,主要在于演述技巧与生活实践的过程。注重讨论不识字的“作家们”所讲故事的结构特点,这本质上是属于口头讲故事的技术与方法。全观诗学观照下的口头文学结构模型,立足于民间文学“技与术”的属性,强调中国口头文学原型结构在其历史实践语境中的展演动机、主体价值与审美意味,这种开放式结构为“人”的出场提供了想象空间,为口头叙述世界建立了简单而可靠的秩序原则。

^① 刘长林:《论外因的重要作用》,《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第9期。末句的“外因”,原文误作“内外”。

除此以外,中国民间文学的代表性结构还有三迭式、循环、套环和生命树等程式结构。而且,它们往往与口头演述的内容息息相关,在口头性讲述的行为与内容之间建立了具有关键性的关联,是民间艺术家现场即兴演述的“结构密码”,为人们提供了面向具体仪式与整合媒介艺术的思维基础。^①

其二,人物伦理方面,全观诗学强调生活实践、伦理关系与“人”的品格的社会属性。口头文学的人物塑造是类属化的,其人物形象往往缺乏鲜明的外貌特征和丰富的性格变化,而是在伦理关系中突出教化功能。口头文学常以惩恶扬善、勇敢奉献的价值导向,让邪恶狡猾、自私自利的反派人物走向失败或灭亡的结局,情节单一却掷地有声,浸润人心、传播道德、弘扬正气。可以说,全观诗学以人物伦理为中心,从高度集中的情节冲突与善恶对立中发掘社会性的主导力量,借助具有良知与担当精神的主人公,建构中国传统社会的圣贤形象。同时,全观诗学注重口头语言的感染力和教化作用,回归社会性的诗教传统和人格修养,使口头文学的社会价值蕴含于人物伦理和诗性品格之中。中国神话英雄的伦理品格尤为突出,他们以集体使命为价值追求,具有诗性的身份形象,而且强调媒介形式转换。“《哪吒》系列动画电影以仿古希腊神话的命运开端,实质上接续的是中国神话的命运意识和集体主义的英雄伦理。影片中随处可见关于反抗命运的言说,这些言说表意含混,却能够激发中国观众的情感共鸣,显示出中国人精神深处独特的命运观念与不信命的反叛精神。”^②全观诗学对英雄伦理的考量与解析,也是在自由的媒介形态之间展开。

当然,中国的哲学思想、民俗实践也为口头文学提供了丰富滋养。民间文学伦理充分吸收了儒、道、释诸家思想,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恻隐慈悲等观念,常常是口头文学中主人公的核心品格,它们不仅具有可信性,而且更加突显了口头文学的教化意义和社会伦理价值。

三 本土资源的艺术融通与全观诗学的理论建构

全观诗学立足本土学术基础,回归中国民间文学的传统经验,重新梳理本土资源并作时代性、类型性和实践性分析,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探索本土民间文学资源的知识现代化路径。对国际口头诗学尤其是“口头程式理论”及其后续发展的深刻反思、吸收,对中国本土实践的细致分析,对口头性作为动态过程的本质揭示,对口头文学所体现的包容性、动态性和嵌入社会生活的审美观照,以及对口头媒介的立体性、人性化及与书写媒介关系的结构性分析,都体现了全观诗学的本土资源价值和媒介方法论价值。当前,全观诗学尚处于深化与丰

^① 参见刘守华《走向故事诗学》,《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② 熊成帅:《叩问命运:〈哪吒〉系列的英雄伦理》,《深圳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

富的理论实践期,其理论潜力巨大。如何在具体研究中落地操作、深化阐释,并有效回应数智时代的系统性挑战,是全观诗学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它标志着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从应用西方理论转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迈出了关键一步。^①

全观诗学自主理论创新需要对中国民间文学本土资源进行挖掘、整理与分析,这也是现代自主知识生产的基本方式。

随着现代科技迭代和信息社会大数据生态的形成,中国民间文学海量本土资源的数字化整理成为可能,如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近二十年来对中国民间文学的数字资源整理。同时,该中心运用数字技术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采录、整理、出版的民间文学资源进行编码和多媒介呈现,再现中国民间文学的演述场景和关联仪式,探索民间文学特定类型长时段的演化与传播规律。这对于理解本土化的口头文学而言有重要价值,受众的心理需求和接受机制亦受到关注,也对了解中国民间文学对不同时代人们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的深刻影响具有直接意义。

全观诗学立足本土资源,面向多媒介民间文学,其理论创新基础是中国民间文学资源的系统性挖掘、整理与媒介形态分析,以建构融媒介时代民间文学的阐释体系为理论目标。因此,全观诗学是在适应数智技术的前提下,探索了一条实现自主知识生产、激活文化基因的本土路径。以家喻户晓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白蛇传、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这些传说可以清晰地透视全观诗学在资源开掘与数智化利用方面的关键价值,还原民间文学的活态传统,突破线性、静态、单一的文本研究。四大传说并非固定的文学剧本,而是历经千百年演变、融合多种艺术形式与地方叙事的文化综合体。牛郎织女传说的雏形可追溯至《诗经》对星宿的拟人化想象,大约在汉代叙事定型,至今仍在七夕习俗中焕发新生。“它在产生、发展与流变的过程中,与农耕文明紧密联结,呈现出一种中国独特的爱情叙事模式。它并未导向一种彻底的悲剧,在美学指向上是一种理想化的爱情。这也体现出中华民族在面对苦难时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这种历史文化隐喻精神内核使得‘牛郎织女’在中国独特的农耕文化下不断扩散,影响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甚至主流文化艺术,对中国民间或主流艺术思维起到重要作用,进而影响了民族文化心理和生命体验。”^②孟姜女传说从《左传》记载的关于杞梁妻的片段,逐渐演变为控诉秦政、歌颂忠贞的宏大悲情叙事,在山海关等地以庙宇祭祀、寒衣节习俗等方式活态传承。“我们可以知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我们又可以知道,它变成的各种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单纯地随着说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随着说者的解释的要求的。我们更就这

^① 参见冯文开《口头诗学的本土化:中国民间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民俗研究》2024 年第 4 期。

^② 徐磊:《面向民间与主流的文化内在整合——论“牛郎织女”的历史文化隐喻》,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第 5 页。

件故事的意义上回看过去,又可以明了它的各种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张的各种社会的需要。”^①白蛇传有中西文化的双重来源,唐传奇《李黄》故事的本土滋养,西方拉弥亚故事约在12世纪前传入杭州^②,二者共同塑造了蛇妖形象。后来融入儒家文化与市井文化之后,白娘子的世俗身份一变而为贤淑、美丽、精明的妻子形象。^③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有大量文人记录,“在东晋末年以前,更具体的一个时间是齐建元之前数百年间,梁祝传说就已经在今浙江鄞县(‘接待院’)和江苏宜兴(善卷山)两地的民间流传了”^④。全观诗学超越传统学术的一维视野,融合文献、田野、媒介学等多维方法,将四大传说视为动态的、集体创作的艺术过程,是从原始仪式、口头演述、地方变异、戏曲改编到当代媒介再造的全链条叙事传统。其资源整合超越了传统的文献辑录,走向演述场景、关联仪式,以及与不同时代人们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的深度关联和跨媒介体验。

数智化技术为这种全观式资源整合与利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面对四大传说分布广泛、版本众多、媒介形式多元的现状,传统的线性整理方式效率低下,难以实现资源的随机存储、提取与关联分析。全观诗学倡导的数字化路径,旨在构建专业化的传说数据库,涵括系统采集传说的多模态资源:如核心叙事在不同历史时期文本(如《诗经》、汉魏六朝笔记、明清小说)中的记载,与之相关的民间习俗(七夕乞巧和孟姜女庙会)、地方风物(西湖雷峰塔和诸暨西施故里)、戏曲影视改编(越剧《梁祝》和白蛇题材电影),以及当代社交媒体中的话题与新大众文艺的再创作。数据库可以设定历史朝代、传说来源、内容主题、传承方式、叙事媒介等结构化字段,利用数据模型关联来立体化呈现每个传说的生命史。将白蛇传说与杭州西湖的地图数据、历代文人题咏、戏曲音频、当代动漫游戏进行关联,便能直观展现其从口头故事到地域文化符号乃至全球性IP的演化轨迹。

全观诗学基于数智化资源的媒介深度分析,能够揭示民间文学类型演化与传播的深层规律,满足当代受众的心理需求,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与价值再生。对四大传说进行大数据分析,可以揭示传统方法难以发现的内在规律。量化分析“爱情与抗争”“人神(妖)之恋”“团圆结局”等主题元素在不同时期、地域、版本中的权重变化,有助于理解社会心理、审美期待、民众观念的思想史变迁。数智化平台能够更精准地洞察接受机制,引导当代受众。正如当前的文化实践所揭示的那样,年轻人依然愿意为这些古老故事买单,但是需要新的媒介艺术来重构故事的现实意义。AI生成艺术剪纸再现了四大传说的女主角形象,浙江梁祝文化公园的沉浸式实景演出、

①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古史辨自序〉中删去之一部分》,顾颉刚著,王煦华编《孟姜女故事研究及其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04页。

② 丁乃通:《高僧与蛇女——东西方“白蛇传”型故事比较研究》,《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陈建宪、黄永林、李扬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③ 孙正国:《媒介形态与故事建构——以〈白蛇传〉为主要研究对象》,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44页。

④ 刘锡诚:《梁祝的嬗变与文化的传播》,《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个人玩家的互动游戏等,都是四大传说数字资源创意解码后的现代表达。^①全观诗学强调普通受众的心理需求和接受机制,这意味着数智化整理既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程,也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本土源泉。全观诗学观照下的四大传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从静态的保护对象转化为可动态参与、可体验、可消费的文化 IP,在数字时代持续发挥凝聚情感、塑造认同的社会功能。

全观诗学以中国民间文学本土资源为创新基石,其价值在中国四大传说的案例中得以凸显。全观视野指导资源的系统性挖掘,数智化技术实现资源的立体化整理与结构化存储,以数据分析与创意转化让古老传说融入当代生活。这一过程正是全观诗学构建中国自主话语体系,使中国民间文学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的关键实践。

本土资源代表着知识生产者的主体地位,也是文化主体历史实践的成果形态。我们可以从本土资源中触摸中国民间文学传统的文化血脉,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智慧创造,本土资源成为全观诗学理论创新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唯一的现象学依据。中国民间文学本土资源有丰富的创新性内涵。一方面,体裁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故事包含神话、传说、狭义的故事等叙事形态;另一方面,中国民间故事也是关于传统文化的概念,强调以民间视角、民间主体讲述和传承中国历史、中国事件和中国记忆。从这一比照中,全观诗学不断强化对本土资源的采集与记录,不断提升对本土资源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水平,其理论建构与问题阐释就有了中国语境的知识来源^②,进而可以梳理这些语境中的本土族群观念,发掘本土资源所代表的知识生产者的主体性意识。

基于本土资源的全观诗学理论创新还体现在方言载体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国民间文学的本土特色除了结构类型、人物伦理与媒介转换外,方言载体是重要的显性特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人文传统哺育的多民族文化主体,必然创造出不同的方言来认识和表达自己所感知的地方性传统。深入调查和忠实记录这些方言俗语,是挖掘整理本土资源的内在要求。丰富多彩的方言世界记载和塑造了独特的民间文学传统。因此,充分强调和全面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方言资源,成为全观诗学理论创新的未来景观。

材料创新来自对方言资源的重视与应用。全观诗学需要构建具有实践性和资源特质的学术话语体系。这些学术话语既可取自方言俗语,亦可以意境、韵味、风骨、气韵、志怪、传奇等美学和文体话语来建构中国民间文学的审美理论,以“家国情怀”“乡土情结”“敬老爱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等本土话语来建构中国民间文学的主题理论。这些理论来源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现实,以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性经典文本为基础材料,如大禹传说^③,从

① 参见程萌《网络游戏中民间文学资源的创新转化》,《文化遗产》2021 年第 5 期。

② 朝戈金:《“全观诗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9 期。

③ 夏楠:《大禹叙事的诗学结构、诗学生态及诗学实践》,《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4 期。

而可以深刻指认全观诗学的本土知识属性。这种以本土资源为基础的全观诗学自主理论创新,可以准确生动地表达中国民间文学的价值、功能和文化内涵,能够重新回归民间文学教化育人、艺术感染的功能和民间文艺所蕴含的诗教传统。

全观诗学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是建构了口头文学与传统文艺一体化的层级谱系。其学术史脉络可以概括为从西方古典学到文化人类学(口头诗学),再到立足中国经验、追求体系化的全观诗学。“全观诗学的理论构架,从抽象层面说,是试图描摹口头文学内部诸文类在形式和功能方面既各司其职、又彼此配合的谱系性关系。在上一个层级,也就是整个文学阵营中,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进而强调其‘互为补角’、互为存在条件的关系。再上一级,将语言艺术(聚焦口头文学)与造型艺术(绘画、雕塑、建筑等)、表演艺术(音乐、舞蹈、曲艺等)、综合艺术(电影、歌剧等)视为一个整体,进而透过纷繁的样式,看到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同构性和统领作用。”^①这一讨论是全观诗学对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作出的里程碑式的理论创见,可命名为“层级谱系观”,极具学术启示,堪称中国民间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原创理论。在口头文学内部,神话、传说、故事、史诗等文类各司其职,又彼此配合,构成多体裁、多层次的文学形态谱系;在文学阵营中,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互为补角”,构成对立统一的交流的文学整体谱系;在所有艺术门类中,语言艺术(口头文学)、造型艺术、表演艺术可被视为一个整体,由此可以探寻一个民族审美心理的同构性,以及构成多个审美层次的文化生态谱系。这种由体裁—功能—生态建构起来的层级谱系理论,强调立足口头观照书面,立足文学观照其他艺术,突破了就口头论口头、就文学论文学、割裂文学与艺术的循环论局限,具有内外融通的宏大理论架构特征。全观诗学之所以能够发现民间文学的层级谱系,根本的逻辑起点是“因为口头性是人类古老常新的信息技术,不仅从未离开,而且一直发挥统领性作用”^②。

全观诗学植根于中国口头文学,超越了孤立、静态、割裂的分析模式,将口头文学置于由内而外、由微观至宏观、由局部到整体的动态、立体、彼此关联的社会科学知识框架之中。其原创性在于,以口头文学为原点生发理论观照,建构“口头文学—文学—艺术”的三维层级谱系。每一层级都拥有独特的内部知识体系与媒介谱系,且层级之间具有递进、互补、贯通的有机结构关系。全观诗学的理论大厦奠基于对口头文学本体的深刻洞察。在口头文学层级,口头文学内部文类的体裁谱系与口头媒介的运作机制互为动力,全观诗学知识体系的核心任务是揭示口头文学内部诸文类(神话、传说、故事、史诗、歌谣、谚语等)的谱系结构,以及不同文类在真实与虚构、生活与想象的谱系轴上共同形成的动态交融关系。支撑这一体裁谱系运作的是独特的口头媒介系统。“文化人类学观念中,口头叙事媒介发挥其文化功能时,口耳相承、音容笑貌的鲜

① 朝戈金:《“全观诗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② 同上。

活体态以及人际口头交往的生活日常性是其传播机制。同时,口头叙事媒介参与建构了神话、史诗等重大文化体裁。因此,口头叙事媒介的人类学讨论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传播媒介的维度,口头叙事媒介呈现出立体性与弱主体性,媒介的工具意义在此获得主体的隐含身份。二是艺术媒介的维度,口头叙事媒介的艺术创作呈现出人生的仪式性与日常生活的审美特性。同时,口头叙事媒介与人类艺术的起源具有互为性关系。”^①全观诗学强调,不能将口头性简单理解为“口头表演”,而应结合媒介性、现场性、交流性和过程性进行整体把握。其知识体系深入探讨了口头创编的思维机制(如大脑文本)与接受机制(如整序接受),并深化分析了程式、主题、故事范型等核心概念。^②

在文学层级,全观诗学认为,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是“互为补角”“互为存在条件”的整体:“共时地看,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关系‘互为补角’:把口头文学比作角 A,书面文学比作角 B,两者相加等于平角,两者构成‘互补’关系。就整个文学传统而言,角 A 大时,角 B 就小。人类社会中,在阅读人口(约等于书面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人群)在总人口中占比很小的情况下,一个民族的口头文学(角 A)往往就居于支配地位;反之,当阅读人口快速增长,书面文学(角 B)占据支配地位时,角 B 就会挤压角 A,这时口头文学的传承、传播、接受和评价等,也都会受到很大挤压。就两者互为补角的关系——此消彼长,一方是另一方的存在条件而言,这个比喻还是有一定道理的。”^③这就突破了将两者简单对立或视口头为书写初级阶段的线性进化观。其知识体系厘清了两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上,它们又存在深刻差异,从而成为互补。这一层级对应的媒介谱系,是“言”与“文”虬结、竞争与共生的交流谱系。^④全观诗学指出,书写技术并非口头传统的终结者,它是从口头传统生长出来的子传统,从未脱离其母体。荷马史诗的写定、《诗经》的编订、格萨尔史诗的口传文本与抄本并行,都展示了“言文桥接”的复杂历程。^⑤被文字固定下来的口头文本成为“书写的遗骸”,虽失去了现场的生命活力,却得以跨越时空获得“第二次生命”。同时,书面文学也反哺口头文学。^⑥人类的信息交流从未被单一媒介垄断,而是在口头性与书写性的动态张力中构建起双维的文学空间,推动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交互与流动。

在艺术层级,跨门类的审美同构与文化生态谱系,是全观诗学提升口头文学理论的关键环

① 孙正国:《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口头叙事媒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6 期。

② 朝戈金:《“全观诗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9 期。

③ 同上。

④ 参见张宝誉《中西对话与内外虬结:中国史诗学术史中的理论脉络与知识体系构建》,《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26 年第 1 期。

⑤ 朝戈金:《口头诗学的文本观》,《文学遗产》2022 年第 3 期。

⑥ 参见董乃斌、程蔷《民间叙事论纲(上)》,《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董乃斌、程蔷:《民间叙事论纲(下)》,《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3 年第 5 期。

节,这使其谱系结构跃升至艺术层级。在宏观的艺术层级中,全观诗学将口头文学的语言艺术、造型艺术(如绘画和雕塑等)、表演艺术(如音乐和舞蹈等)、综合艺术(如电影和歌剧等)视为一个整体^①,透过纷繁的艺术样式,探寻民族审美心理的同构性和起统领作用的知识体系目标。这意味着,一个民族对于对称、节奏、叙事模式、情感表达的偏好,会像基因一样,编码在从史诗演述到民间绘画、从戏曲唱腔到建筑装饰等不同艺术形式之中,形成一种可辨识的文化风格。此层级的媒介谱系囊括了声音、文字、图像、身体、物质材料等综合性文化表达与感知系统,构成了完整的文化生态谱系。三个层级共同构成了由里向外、由微观向宏观、由局部向整体发展的谱系结构关系。口头文学层级是内核与起点,其体裁谱系是文学整体谱系的基础构件;文学层级是关键的中环节,其交流谱系沟通了内在的口头性与外显的各类艺术表达;艺术层级则是最终的整合场域,将文学问题还原到人类文化生态的整体图景中予以定位和阐释。这种结构体现了全观诗学“恪守口头文学的理论视角和学术立场来统摄文艺活动的整体”^②的方法论原则。

结 语

全观诗学的核心特点在于强调整体性、系统性和关联性的全观视野,将口头文学置于文化生态系统和多维艺术谱系中进行考察,确立口头性的根本地位,并超越口头/书写的简单二元对立,代之以“言文虬结”的复杂互动观。^③朝戈金在全观诗学的思考中也认可了这种系统性,他以巴·布林贝赫研究蒙古英雄史诗时提出“整一性”^④的诗学思想为例,认为巴·布林贝赫基于本土诗歌材料的理论升华,蕴含着从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出发来讨论民族审美理念的学术理想,这对全观诗学有重要启示作用。中国民间文学不仅是媒介形态的文学概念,而且是跨媒介的全观概念:从口头媒介,到书面媒介记录和文人改写,再到表演媒介的戏剧、电影改编,还有电子游戏建构的体验性民间文学,这些共同形成了全媒介的民间文学整体。全观诗学由此开启了艺术形态的民间文学概念,这种艺术全观廓清了长期以来理论界摇摆于民间文学与民间文艺之间的学术盲点,重新将艺术与民间文学还原为生活的、综合的文学。音乐艺术表达的说唱民间文学、空间艺术表达的图像民间文学、视听艺术表达的表演民间文学,都成为全观诗学的研究对象,这本质上也是民间文学的生活图景。也就是说,全观诗学探索自主知识创新路径的基础条件是以中国民间文学的本土资源为对象和根基,从本土资源的实践与应用中获得创新动力和素材。

① 朝戈金:《“全观诗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② 同上。

③ 参见张宝誉《中西对话与内外虬结:中国史诗学术史中的理论脉络与知识体系构建》,《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

④ 巴·布林贝赫:《蒙古英雄史诗中马文化及马形象的整一性》,乔津译,《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

站在人类的诗学立场评述,全观诗学的层级谱系理论在当今媒介时代具有独特而深远的意义。一方面,口头性以“次生”的形式在互联网、社交媒体、音频视频中强势回归,在数字时代与书写、图像、代码深度融合,形成前所未有的电子集市。全观诗学的谱系观为我们理解这种复杂交融的媒介生态提供了卓越的框架。它让我们看到,网络文学的口语化追求、互动叙事的现场感、短视频的演述逻辑,正是口头文学谱系在新时代的延续与变异。另一方面,全观诗学将文化视为非线性的、可跨越巨大时空传播的有机体,为全球化、数字化语境下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指明了方向。非遗保护不是制作静态化石,而是理解其内在谱系与运作机制,助力其在新的媒介生态中实现活态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全观诗学通过立足于中国经验又具有人类关怀的层级谱系理论,成功地将中国丰富的本土资源转化为人类共享的理论资源,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文学理论体系,参与并引领全球人文对话,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与充满活力的方案。它启示我们,真正的理论自主源于对自身文化脉络最深层的谱系化洞察,并将其置于人类精神的整体星空下,点亮卓越的中华文明之光。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优秀种子重点培育项目“故事诗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CCNU24ZZ031)阶段性成果。

(孙正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 尧】